

马成成,肖璐.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产生机制[J].江苏农业科学,2018,46(22):389-394.  
doi:10.15889/j.issn.1002-1302.2018.22.089

#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产生机制

马成成,肖璐

(江苏大学管理学院,江苏镇江 212013)

**摘要:**随着城镇化进程的逐步推进,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与行为也逐渐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计划行为理论在国内外对行为的研究中表现出较高的解释力与预测力,基于该理论框架模型,通过提炼凸显信念编制问卷,在全国范围内收集 1 618 份样本,对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农民工收益预期、指令性规范、自我效能以及控制力对落户意愿有显著正向作用,而损失预期对落户意愿有显著负向作用;自我效能、控制力、落户意愿对落户行为有显著正向作用;示范性规范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没有显著影响。该结论对探明农民工落户行为产生机制,更好地激励农民工城镇落户具有重要启示作用。

**关键词:**计划行为理论;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机制

**中图分类号:** F323.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1302(2018)22-0389-06

2016 年 10 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推动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方案》,明确提出推进 1 亿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落户的主要目标,并提出到 2020 年,全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提高到 45%,各地区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差距比 2013 年缩小 2 个百分点以上的具体目标。我国 2.77 亿农民工是户籍制度改革的主要对象,同时也是推进以人为核心城镇化重要的微观基础。然而,2010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针对近 11 万农民工的一项调查发现,愿意转为城市户口的农民工仅占 20%~25%,如果要交回承包地才能转户口,该比例则

仅有 10%<sup>[1]</sup>。2010 年以来,随着农村“拉力”和城市“推力”多因素的作用,农民工落户城市的行为和意愿不进反退<sup>[2]</sup>。加上农民工数量上的增量逐年减少,不难发现,当前农民工城镇化参与度低成为影响城镇化进程的突出问题。如何让这部分群体有能力并且愿意落户城镇,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焦点。萃取现有文献发现,国外文献重点关注经济与社会文化情境两方面因素对农民工城镇定居意愿的影响<sup>[3-4]</sup>,同时新生代与老一代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的代际差异也是学者们关注的重点<sup>[5]</sup>。国内学者则较全面地从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等学科领域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获得了较丰富的研究成果,并发现性别、年龄、社会融入、举家迁移、收入水平等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影响显著<sup>[6-8]</sup>。然而在一些因素的具体作用方面,学者们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如有学者认为,稳定的工作收入是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保障,收

收稿日期:2017-06-16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编号:15CRK010)。

作者简介:马成成(1992—),女,安徽芜湖人,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新型城镇化问题研究。E-mail:13739194450@163.com。

联动等特点,这“6 动”也为我国乃至各省(市)的城镇化提供了有益经验。

在我国比较成功的城镇化模式中,云南省的“山地城镇化”模式可以为安顺市城镇化模式提供借鉴。云南省 2011 年开始全面探索和实践保护坝区农田、建设山地城镇的发展道路,按照守住红线、统筹城乡、城镇上山、农民进城的要求,阶段性地取得了 10 类山地开发类型的建设成果。但是云南省的城镇化模式也面临着环保、建设和使用成本增加、法律边界不清、山地城镇聚集效应较弱等问题。

综上所述,安顺市在探索“一分三向”城镇化的过程中,政府在城市规划、政策制定、公共资源配置等方面必须结合当地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以及当地各方面的实际情况进行综合思考和实施。要尽可能回避国内外、省内外城镇化过程中走过的弯路和陷入的困境。

## 4 结束语

山地特色城镇化是一种新型城镇化,不能脱离当地的自然地理特征实际,更不能丢弃当地的人文地理特色,不仅要传

承当地优秀民族文化,还要根据时代精神利用科学技术成果,吸收时代精华文化元素,从而建成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具有当地特色的新型生态中小城镇,“一分三向”城镇化的安顺模式是其中典型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模式,其主要特点、基本原则以及理论价值、现实价值还须进一步探析。

## 参考文献:

- [1]常明明.推进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J].当代贵州,2015(28):26.
- [2]魏媛,吴长勇,徐筑燕.贵州山地特色新型城镇化可持续发展研究[J].改革与战略,2015(5):133-137.
- [3]周兵,蒋京梅,周红.思路创新重点突出特色彰显——对云南特色山地城镇化的思考[J].云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8(5):41-44.
- [4]邓伟,唐伟.试论中国山区城镇化方向选择及对策[J].山地学报,2013,31(2):168-173.
- [5]安顺市投资促进局.安顺简介[EB/OL].(2017-03-13)[2017-05-25].[http://www.anshun.gov.cn/wsfw/bmlqfw/zsy\\_79565/tzhj/201807/t20180712\\_3418785.html](http://www.anshun.gov.cn/wsfw/bmlqfw/zsy_79565/tzhj/201807/t20180712_3418785.html).

入越高,农民工永久迁移意愿越高<sup>[9]</sup>。也有学者认为,对于全家进城农民工而言,收入越低越倾向于在城市落户,因为对于较高收入者而言,并不在乎户籍给他们带来的生活和就业方面的便利<sup>[7]</sup>。尽管由于调查样本、研究情境或理论框架的差异导致实证研究结论偏差并不少见,但通过文献研究发现,该领域研究结论差异性的原因在于缺乏一个理论框架的支撑,导致学者在实证研究过程中变量选取呈现出一定的随意性,加之样本选择的差异性,导致诸多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相反。因此,有必要运用正确的理论对该问题进行系统的理论梳理和实证分析。文献分析还发现,现有研究多关注农民工落户意愿及其影响因素,较少有学者关注到农民工的落户行为。对于农民工而言,落户意愿只是一种心理倾向,尽管意愿对行为具有很大的预测力,但对于农民工落户行为这类政策影响较大的非完全主观行为研究而言,农民工有了城镇落户意愿未必产生实际落户行为,因为在此过程中还受到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的影响,这就须要借助部分已落户农民工样本数据进行深入分析。因此,本研究将行为科学经典理论应用于分析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根据计划行为理论构建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研究框架,通过对包含部分已落户农民工的样本进行调查分析,探讨农民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的影响机制,亦是对西方计划行为理论在中国农民工行为研究中的普适性进行检验。

## 1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 1.1 计划行为理论

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TPB)是由 Ajzen 提出的,是理性行为理论(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TRA)的发展与改进(图 1)。TPB 理论认为,行为态度(attitude)、主观规范(subjective norm)和知觉行为控制(behavior norm)3 个变量通过影响行为意愿从而决定行为的产生<sup>[10]</sup>。行为态度是个体内在相关要素的反映,主观规范反映的是重要他人或团体等外部因素对个体行为决策的影响,知觉行为控制反映的是个体对促进或阻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sup>[11]</sup>。行为意愿是个体实施行动前的动机,是一个不断积累和强化的过程,行为意愿越强,个体实施行为的可能性则越大。TPB 理论自提出后,被广泛应用于解释社会与学习行为、饮食行为、临床医疗与筛检行为、药物成瘾行为、运动行为等<sup>[12]</sup>,已被多数研究者验证对行为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与预测力,是行为研究的理论基石。TPB 理论之所以能如此广泛地运用到各种行为之中,是因为它综合了影响行为的各类要素,能为研究者探讨具体行为产生机制提供研究思路,并有较好的信度与效度,对行为具有较高的解释力。农民工落户行为亦受到内外部多种要素共同作用,运用经典的理论框架和规范的研究方法对农民工落户行为产生机制展开探讨具有较好的理论和实践价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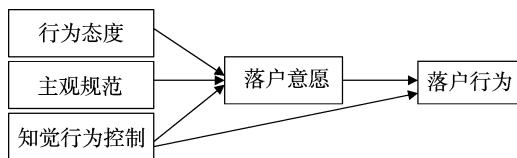


图1 计划行为理论模型

### 1.2 农民工落户行为态度与落户意愿的关系

行为态度是个体在某种信念下,对执行某特定行为有利或者不利程度的估算以及对行为整体的预期综合评估<sup>[13]</sup>。当个体认为其行为对自己是有利的,就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态度,反之,如果认为该行为对自己是不利的,则会产生消极的行为态度。本研究基于前期调研,尝试从一个新的视角,即通过城市户口福利与农村户口福利 2 个维度来考察农民工的行为态度,由此产生农民工对城镇落户行为有利或不利的行为评价。行为态度是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内部动机的主要体现。对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而言,城镇户口福利价值诸如享受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是影响其城镇落户意愿的重要因素<sup>[14]</sup>。通过在城镇落户,农民工获得制度上的“市民”身份,可享受城镇“市民”的待遇,为农民工未来在城镇生活奠定基础。而与城镇户口福利相对应,农村户口福利也是农民工不愿放弃农村户口、不打算去城镇落户的重要原因。随着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的逐渐完善,农民工在农村也能享受到较好的待遇。且伴随着农村土地的升值,农民工土地财产权(土地财产权主要表现为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 3 种权益)的处置和保障问题也成为制约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核心因素<sup>[15]</sup>。因此,作出是否在城镇落户的选择则是农民工对于城镇户口福利与农村户口福利二者之间相博弈的结果。农民工认为城镇户口的待遇优于农村户口的待遇,则会选择在城镇落户,反之,农民工则会依旧保留农村户口。从这个角度看,农民工在权衡城镇落户的“收益与损失”前提下进而作出决策,“收益”即获得的城市户口福利,“损失”即失去的农村户口福利。因此,参考以往研究者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对态度的测量并结合本研究的实地调研结果,试图从“收益预期”与“损失预期”2 个维度测量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的态度。当农民工感知到城市户口福利时,预期落户城镇会给自己自身带来收益,则会对农民工积极落户意愿起到促进作用;相反,当农民工权衡农村户口福利更佳,预期落户城镇会给自己带来更大损失时,则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其城镇落户意愿。综上,提出如下假设: H1a, 农民工收益预期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意愿; H1b, 农民工损失预期负向影响其城镇落户意愿。

### 1.3 农民工落户主观规范与落户意愿的关系

主观规范是指个体在决定是否执行某特定行为时所受到来自外界社会环境的影响<sup>[13]</sup>,是个体所感知到的参与某项行为的社会压力,反映重要组织或机构对个体决策的影响<sup>[16]</sup>。Cialdini 等认为,主观规范主要由个体规范(personal norm)、示范性规范(descriptive norm)和指令性规范(injunctive norm)组成<sup>[17]</sup>。而更多学者认为个体规范仅用来解释部分与道德相关的行为。因此,当前学术界大多将示范性规范和指令性规范作为主观规范的 2 个维度。通过实践调研发现,农民工感知到的指令性规范主要表现在父母等对其城镇落户行为及结果的期望压力。在中国儒家思想的长期影响下,晚辈对于长辈尤其是父母会习惯性地遵从,并且会自发性地接受长辈给自己赋予的角色以及履行相关的义务。当农民工的父母希望其能在城市有所作为,能在城市定居并长久发展时,他们则会给予农民工积极的支持,此时个体农民工则会倾向于接受父母的期望,在这些动因下逐渐产生“我应该积极去城镇落户”的想法,从而产生城镇落户意愿。农民工感知到的示范

性规范主要表现在身边重要的参照个体(如亲戚、资历相仿的朋友)积极进城落户的示范效应。即便农民工自身未真正进城落户,但是当身边的亲戚或资历相仿的朋友均纷纷落户城镇,享受到一定的福利后,会对农民工起到一定的示范作用,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同时,传统的中国人也较注重亲戚朋友之间的相互往来,联络相互之间的感情,更倾向于与亲戚朋友生活在一起,这类现象也是中国传统文化所决定的。并且在朋友亲戚的影响下,会减少农民工的心理成本,为其在城镇落户提供必要的情感支撑,会激发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意愿。综上,提出如下假设:H2a,指令性规范正向影响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H2b,示范性规范正向影响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

#### 1.4 农民工落户知觉行为控制与落户意愿、落户行为的关系

知觉行为控制是指个体感知到执行某一行为的容易或困难程度,反映个体对影响执行行为因素的知觉,知觉行为控制能力越强,可控性因素越多,行为实现的可能性则越大<sup>[10]</sup>。知觉行为控制主要包括控制力和自我效能两方面因素,其中控制力主要指个体对于时间压力、成本等资源方面的控制能力;自我效能主要指个体对自身的知识技能、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拥有的自信程度。事实上,控制力是农民工综合考虑其自身具备的资源、实施某行为成功的概率等要素后,对城镇落户行为控制程度进行客观评价。城镇落户并不是一蹴而就的,其过程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如果农民工对资源的控制能力不够,在城镇落户过程中遇到因为资源限制而难以克服的困难,则会严重影响其落户的积极性以及落户行为的执行,反之,当农民工认为自己可以较好地掌控城镇落户的进程与结果,其积极的落户意愿则会被激发,实施城镇落户行为的可能性就会越大。另外,自我效能是农民工对自身完成城镇落户的信念,是农民工认为自己是否有能力去完成落户,是其对于自己完成这一行为的自信程度,而非指代农民工自身拥有能力的大小。农民工自我效能越强,自信心越高,其努力程度也会越强,在城镇落户过程中就会有更坚定的信心去克服城镇落户过程中的困难,敢于接受落户过程中的一切挑战,并且为了证明自身的能力,验证自己的想法,农民工也会将城镇落户的想法付诸实践,从而完成落户。从该角度看,农民工对于自身完成落户的自我效能感是影响其落户意愿及行为的重要因素。综上,提出如下假设:H3a,农民工控制力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意愿;H3b,农民工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意愿;H3c,农民工控制力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行为;H3d,农民工自我效能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行为。

#### 1.5 农民工落户意愿与落户行为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个体实施某一行为的意愿与该行为关系紧密,如果测量得当,行为意愿对于行为本身而言具有较高的解释力与预测力。诸多学者对意愿与行为进行元分析,也得出行为意愿对行为均具有显著影响<sup>[18-20]</sup>。因此,落户意愿表示农民工试图实现落户的程度及其为了达成落户行为所愿意投入努力的程度,是个体行为最好的预测指标之一,是农民工落户行为的内部驱动力。只有当农民工发自内心认为城镇落户对自身有益且愿意执行该行为时,才会产生积极的行为意愿,激发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综上,提出假设 H4:农民工落户意愿正向影响其城镇落户行为。

在上述理论假设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

论模型的分析框架(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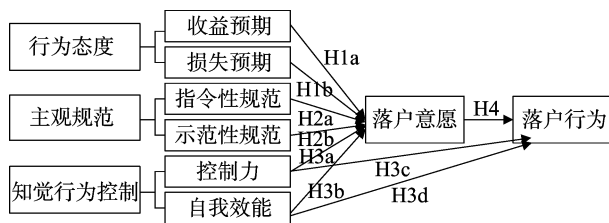


图2 理论分析框架

##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收集

### 2.1 TPB 问卷的编制

计划行为理论视角下的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研究涉及农民工行为态度、主观规范、知觉行为控制、落户意愿、落户行为5个变量。为提高问卷的适用性,在借鉴成熟量表的基础上,结合前期调研结果对量表进行修正和改进,从而编制符合本研究需要的关于农民工城镇落户的TPB卷。

2.1.1 明确凸显信念 凸显信念存在于个体潜意识中,是行为态度、主观规范与知觉行为控制形成的基础。运用计划行为理论设计问卷时,如果过度依赖前人的量表来设计题项,有可能会降低研究总体信度。因此,为确保问卷的有效性并获得高信度的研究结果,有必要挑选出根据实际调研得出的重要变量,即凸显变量作为编制正式问卷的重要参考之一<sup>[21]</sup>。本研究拟通过对代表样本实施深度访谈以提炼出关于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的凸显信念。笔者所在课题组根据2014年11月《国务院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选取江苏省不同类型城市为样本对象,于2016年4—5月走访了特大城市南京市、I型大城市苏州市、II型大城市徐州市和昆山市、中等城市镇江市、小城市句容市和睢宁县,对76名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情况进行了深度访谈,访谈对象包括35名已经在城镇落户的农民工样本。在收集基本信息的基础上,主要围绕3类开放性问题展开访谈:您认为在城镇落户的利弊是什么?哪些个人/组织会影响您决定在城镇落户?哪些因素会促使/抑制您在城镇落户?录音转换为文本后,根据扎根理论的三级编码原则,运用NVIVO 10质性分析软件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处理,最终梳理出频次较高的编码形成凸显信念。

2.1.2 问卷设计与预调查 在凸显信念提取基础上参考部分成熟量表来编制问卷。采用李克特5级量表进行测量,1表示“完全不符合”,5表示“完全符合”。具体来说,行为态度的测量基于凸显信念并结合Phan等对行为态度的测量<sup>[22]</sup>与Bagozzi等对行为态度的测量<sup>[23]</sup>,从收益预期与损失预期两方面确定题项,如“我认为在城镇落户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的福利”“我认为在城镇落户会让我享受不到农村户口的福利(土地收益等)”等题项,最终形成7个题项的行为态度测量分量表。主观规范的测量基于Cialdini等对主观规范的测量<sup>[17]</sup>与Ajzen对主观规范的测量<sup>[11]</sup>,从指令性规范和示范性规范两方面确定题项,如“我父母希望我在城镇落户”“我身边的亲戚朋友都已经在城镇落户”等题项,最终形成6个题项的主观规范测量分量表。知觉行为控制基于Ajzen等的研究确定控制力与自我效能2个维度<sup>[10,16]</sup>,如“我有足够的资源、能力去城镇落户”“我相信只要我下定决心去城镇落户就一定能成功”等题项,最终形成6个题项的知觉行为控制

测量分量表。落户意愿与行为采用 Fishbein 等的量表<sup>[24-25]</sup>，如“我希望把户口迁到现在工作的城市”“我的户口已经迁到务工城市”等题项，最终形成 3 个题项的落户意愿测量分量表与 3 个题项的落户行为测量分量表。

之后进行预调研工作。主要以邮寄、电话、现场调查的方式与前期访谈的 76 名农民工完成调查，另外，在宁镇扬地区增加了 54 位已落户农民工的有效样本。通过对 130 份预调查数据的处理和探索新因子分析，发现在剔除了“我希望把户口迁到老家附近的县城”和“我的户口已经迁到老家附近县城”2 个因子载荷均小于 0.5 的题项后，问卷效度较高。各因子和全部题项的 Cronbach's  $\alpha$  信度均大于 0.8，信度较好。故形成包含 23 个题项的最终问卷。

2.2 数据采集

笔者所在课题组随后开展了正式调查。选取北京市、上

海市、广东省、浙江省、江苏省、山东省、湖北省、河北省、福建省、广西壮族自治区、湖南省等 11 个地区为样本地区，这些地区是农民工流入或流出较多的地区，同时结合不同类型城市进行取样。调查对象是在城市务工的外来人员，其户口性质是农业户口或农业户口已转为当地城市户口的农民工群体。正式调研采用现场调查方式，2016 年 7—10 月分别走访调研城市，一方面根据当地人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门的农民工管理办公室识别农民工用工较多的企业进行现场调查，这种方式能够便捷获取样本，然而发现已落户农民工样本较少。因此，另一方面根据当地公安部门户籍登记系统识别部分办理暂住证或转户口的农民工，对这部分农民工落户情况进行调研并完成调查问卷。最终历时 4 个月的走访调查，共发放问卷 1 677 份，回收 1 658 份，有效问卷 1 618 份，有效回收率 96.5%（表 1）。

表 1 样本的构成分布

样本特征	分类标准	人数(人)	比重(%)	样本特征	分类标准	人数(人)	比重(%)
性别	男	979	60.5	婚姻情况	已婚	890	55.0
	女	639	39.5		未婚	728	45.0
年龄	20 岁及以下	31	1.9	文化程度	小学及以下	30	1.9
	21~30 岁	973	60.1		初中	123	7.6
	31~40 岁	489	30.2		高中/中专/技校	387	23.9
	41~50 岁	110	6.8		大专	921	56.9
	51 岁及以上	15	0.9	城市类型	本科及以上	157	9.7
	2 000 元及以下	59	3.6		特大城市	900	55.6
收入水平	2 001~4 000 元	521	32.2		大城市	454	28.1
	4 001~6 000 元	557	34.4		中等城市	126	7.8
	6 000 元以上	481	29.7		小城市	138	8.5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发现，男性样本居多，占 60.5%，女性占 39.5%；年龄以 21~30 岁居多，占 60.1%，这与我国当前外出务工主要是青壮年的现实状况相符；学历大部分是大专，占 56.9%，其次是高中/中专/技校，占 23.9%，不难发现，随着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外出务工人员的主力，其受教育程度较上辈有显著提高；收入在 2 001~4 000 元（占 32.2%）、4 001~6 000 元（占 34.4%）、6 000 元以上（占 29.7%）比重没有明显差异，收入在 2 000 元及以下（占 3.6%）比重较少；从样本的分布来看，特大城市较多，占 55.6%，其次是大城市（占 28.1%），中等城市（占 7.8%），小城市（8.5%）。样本特征符合本研究需要。

3 数据分析与研究结果

3.1 信度与效度分析

本研究使用 SPSS 20.0 进行数据处理，并采用 Cronbach's  $\alpha$  系数作为各量表信度判断的标准。结果显示，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态度分量表、主观规范分量表、知觉行为控制分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分别为 0.832、0.837、0.819。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和行为量表的 Cronbach's  $\alpha$  系数值分别为 0.871、0.827（表 2）。可见所有因子的 Cronbach's  $\alpha$  值均大于 0.8，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水平。

量表效度方面主要从内容效度、结构效度、收敛效度三方面进行考察。首先，为保证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本研究通过开放式访谈收集凸显信念，在此基础上参考该领域内的

部分成熟量表进行问卷设计。同时，征询并采纳相关专家的意见，经过反复修改和提炼，进一步保证量表的代表性。因此，本研究问卷具有较高的内容效度。其次，本研究主要采用 Fornell 等提出的三重收敛标准来检验问卷的收敛效度（表 2）<sup>[26]</sup>。第一，完全标准化的因子载荷值介于 0.709~0.941 之间，均大于最低临界值 0.5，且  $P < 0.05$ ，达到显著水平；第二，组合信度（CR）值介于 0.910~0.946，均大于最低临界值 0.7；第三，平均萃取变异值（AVE）介于 0.830~0.931，均大于最低临界值 0.5。根据上述标准，本研究问卷具有较高的收敛效度。最后，本研究主要运用 AMOS 17.0 进行验证性因子分析，通过模型拟合程度来检验问卷的结构效度（表 3），卡方自由度比（ $\chi^2/df$ ）小于 5，均方根误差（RMSEA）小于 0.08，标准拟合指数（NFI）、相对拟合指数（RFI）、增量拟合指数（IFI）、非规范拟合指数（TLI）、比较拟合指数（CFI）等指标均大于 0.9，这些指标均表明模型整体拟合良好，本研究具有较高的结构效度。

3.2 假设检验

本研究利用 AMOS 17.0 结构方程软件计算各变量间的回归路径，模型拟合度较高，对研究结果进行检验（表 4）。收益预期、指令性规范、自我效能、控制力对落户意愿有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272、0.252、0.263、0.091，在 0.001 或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  $t$  检验，故 H1a、H2a、H3a、H3b 得到验证；损失预期对落户意愿有负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为 -0.130，在 0.001 的水平上通过  $t$  检验，H1b

表 2 信度分析、因子分析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值	CR	AVE	α 值	方差解释量 (%)	潜变量	观测变量	因子载荷值	CR	AVE	α 值	方差解释量 (%)
指令性规范	ZG1	0.928	0.929	0.830	0.792	72.774	收益预期	SY1	0.764	0.946	0.846	0.832	74.688
	ZG2	0.912						SY2	0.816				
	ZG3	0.836						SY3	0.850				
示范性规范	SG1	0.709	0.940	0.851	0.819	75.991	损失预期	SY4	0.851	0.929	0.931	0.871	88.587
	SG2	0.726						SS1	0.896				
	SG3	0.845						SS2	0.901				
控制力	KZ1	0.899	0.910	0.851	0.819	75.991	落户意愿	SS3	0.840	0.910	0.914	0.827	85.454
	KZ2	0.893						YY1	0.922				
	KZ3	0.752						YY2	0.941				
自我效能	ZN1	0.891	0.910	0.851	0.819	75.991	落户行为	XW1	0.911	0.910	0.914	0.827	85.454
	ZN2	0.748						XW2	0.918				
	ZN3	0.907											

表 3 模型拟合指标比较

拟合指数	$\chi^2/df$	NFI	RFI	IFI	TLI	CFI	RMSEA
判断标准	≤5	≥0.90	≥0.90	≥0.90	≥0.90	≥0.90	≤0.08
模型指标	4.845	0.942	0.929	0.953	0.943	0.953	0.049

表 4 路径分析结果

假设	作用路径	标准化路径系数	t 值	P 值	检验结果
H1a	收益预期→落户意愿	0.272	9.709	0.000	支持
H1b	损失预期→落户意愿	-0.130	-4.896	0.000	支持
H2a	指令性规范→落户意愿	0.252	8.256	0.000	支持
H2b	示范性规范→落户意愿	0.070	1.945	0.052	不支持
H3a	自我效能→落户意愿	0.263	9.432	0.000	支持
H3b	控制力→落户意愿	0.091	3.366	0.021	支持
H3c	自我效能→落户行为	0.489	14.436	0.000	支持
H3d	控制力→落户行为	0.066	2.307	0.000	支持
H4	落户意愿→落户行为	0.065	2.113	0.035	支持

得到验证;自我效能、控制力、落户意愿对落户行为有正向影响,标准化路径系数分别为 0.489、0.066、0.065,在 0.001 或 0.05 的水平上通过 t 检验,H3c、H3d、H4 得到验证。示范性规范对落户意愿的标准路径系数为 0.07,在 0.05 的水平上未通过显著性检验,H2b 未得到验证。

4 结论

本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视角,通过问卷调查并建构结构方程模型揭示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第一,行为态度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有显著作用,其中,收益预期产生正向作用,而损失预期产生负向作用。农民工可以享受到城市户口给自己带来的便利及收益,这种对城镇落户的收益预期是促进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产生的重要因素。而损失预期是农民工对于实施落户行为所带来的失去享受农村户口福利的担心,如放弃土地财产权以及离开熟悉的生活环境等,这些因素均是阻碍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形成的重要因素。农民是理性的,当前农村土地政策尚不明确,土地价值不断提升,相反,在城市户口附着的各项福利难以一步到位的情况下,农民工在城镇落户问题上更多持观望态度。而改变其决策的关键可能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方向。因此,政府须要逐渐完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尤其是教育资源的

共享与开放,增强城镇户口“拉力”,吸引农民工进城落户。同时,通过土地确权在保障农民工土地财产权的基础上稳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第二,主观规范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有部分作用,其中,指令性规范产生正向作用,而示范性规范对于农民工落户意愿没有影响。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下,家庭因素对农民工城镇落户的影响较大,因此能否得到父母的支持是农民工决定城镇落户的重要影响因素。前期调研发现,有不少农民工不愿意落户城镇的原因在于担心父母在农村无人照料,又没有能力将父母随迁在城市,在此顾虑下便打消了城镇落户的念头。可见,为促进农民工城镇落户,须要获得其长辈的支持,政府部门应加强正面宣传,更应积极完善农村养老制度,使老人“老有所养”,解除农民工城镇落户的后顾之忧,促进农民工城镇落户。而示范性规范对农民工落户意愿并没有影响,该结论虽与本研究假设相背离,却也符合中国情境下的农民工城镇落户现状。中国传统观念认为,户籍实际上代表着农民工的“根”,当考虑将户口迁走时,农民工并没有因为模仿、从众等原因盲目作出选择,而是根据个人工作和家庭的实际情况作出决策。第三,知觉行为控制对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行为有显著作用,农民工自我效能、控制力均产生正向作用。且自我效能对落户意愿、行为的作用强度(0.263、0.489)远大于控制力(0.091、0.066)对二者的影响。

该指标也说明农民工对其自身知识技能、信息识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拥有的自信程度对落户意愿甚至行为的产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因此,应培养农民工城镇落户的信心并创造有利于落户的外在环境,使农民工在拥有充足自信心的前提下也有条件去落户,只有内因与外因相结合,才能有效激发农民工的城镇落户意愿,推动农民工城镇落户。此外,农民工应充分发挥自我效能,参加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自身能力,增强对知识辨别与获取能力等方面的自信心。第四,计划行为理论对于解释农民工城镇落户行为具有较好的解释力。但与国内学者运用计划行为理论来解释创新行为、渔民参与专业合作组织行为相比<sup>[27-28]</sup>,本研究意愿与行为关系相对较弱,落户意愿对落户行为作用路径系数仅为 0.076。其原因可能是相比之下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行为”的转化更多受外部因素的制约。如不同类型城市户籍政策带来的落户门槛就成为有落户意愿农民工能否顺利落户的一大障碍。且对于农民工来说,“就业机会与落户机会相互分离”同样阻碍了其在城镇落户。大城市、特大城市提供大量的就业岗位,亦需要外来农民工从事临时性、服务性的工作,却难以容纳这些农民工落户;中小城镇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却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农民工可能连落户的意愿都没有。该矛盾也导致农民工落户“意愿-行为”转化困难重重。另外,考虑到不同类型的城市的政策差异较大,后期研究应该关注 4 种类型城市农民工落户意愿和行为的比较,提出有针对性的引导农民工城镇落户的政策措施。

#### 参考文献:

- [1] 张翼. 农民工“进城落户”意愿与中国近期城镇化道路的选择[J]. 中国人口科学, 2011(2): 14-26, 111.
- [2] 唐宗力. 农民进城务工的新趋势与落户意愿的新变化——来自安徽农村地区的调查[J]. 中国人口科学, 2015(5): 113-125, 128.
- [3] Chen S, Liu Z. What determines the settlement intention of rural migrants in China? Economic incentives versus sociocultural conditions[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6(58): 42-50.
- [4] Nalini Mohabir, Jiang Y, Ma R. Chinese floating migrants: rural-urban migrant labourers' intention to stay or return[J]. Habitat International, 2017(60): 101-110.
- [5] Liu C, Jianling X U. Second generation peasant workers and their citizenization[J].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007, 17(1): 6-12.
- [6] 张鹏, 郝宇彪, 陈卫民. 幸福感、社会融合对户籍迁入城市意愿的影响——基于 2011 年四省市外来人口微观调查数据的经验分析[J]. 经济评论, 2014(1): 58-69.
- [7] 刘燕, 李录堂. 全家进城农民工城镇落户需求及影响因素实证研究——以西安市为例[J].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2015(5): 74-81.
- [8] 李俊霞. 农民工城镇落户意愿调查研究——以四川为例[J]. 经济问题, 2016(7): 65-69.
- [9] 马瑞, 章辉, 张森, 等. 农村进城就业人员永久迁移留城意愿及社会保障需求——基于四省农村外出就业人口的实证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11(7): 55-65.
- [10] Ajzen I.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Organizational Behavior and Human Decision Processes, 1991, 50(2): 179-211.
- [11] Ajzen I. Perceived behavioral control, self-efficacy, locus of control, and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2002, 32(4): 665-683.
- [12] 段文婷, 江光荣. 计划行为理论述评[J]. 心理科学进展, 2008, 16(2): 315-320.
- [13] Ajzen I. From intentions to actions: a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J]. Springer Berlin Heidelberg, 1985, 22(8): 11-39.
- [14] 贾淑军. 城镇化中农户移居与农民工转户意愿研究——以河北唐山为个案[J]. 经济管理, 2012(11): 177-183.
- [15] 郭晓鸣, 张克俊. 让农民带着“土地财产权”进城[J]. 农业经济问题, 2013(7): 4-11, 110.
- [16] Kraft P, Rise J, Sutton S, et al. Perceived difficulty in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perceived behavioural control or affective attitude? [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05, 44(3): 479-496.
- [17] Cialdini R B, Kallgren C A, Reno R R. A focus theory of normative conduct: a theoretical refinement and reevaluation of the role of norms in human behavior[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91, 24(1): 201-234.
- [18] Godin G, Kok G. The 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r: a review of its applications to health-related behaviors[J]. American Journal of Health Promotion Ajhp, 1996, 11(2): 87-98.
- [19] Hausenblas H A, Carron A V, Mack D E. Application of the theories of reasoned action and planned behavior to exercise behavior: a meta-analysis[J]. Journal of Sport and Exercise Psychology, 1997, 19(1): 36-51.
- [20] Sheeran P, Orbell S. Do intentions predict condom use? meta-analysis and examination of six moderator variables[J]. British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8, 37(2): 231-250.
- [21] Ajzen I. Constructing a TPB Questionnaire Conceptual and Methodological Considerations [EB/OL]. [2017-01-01]. <http://www.unix.oit.umass.edu>.
- [22] Phan P H, Wong P K, Wang C. Antecedents to entrepreneurship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 in singapore: beliefs, attitudes and background[J]. Journal of Enterprising Culture, 2002, 10(2): 151-174.
- [23] Bagozzi R P, Lee K H, Van Loo M F. Decisions to donate bone marrow: the role of attitudes and subjective norms across cultures[J]. Psychology and Health, 2001, 16(1): 29-56.
- [24] Fishbein M, Ajzen I. Belief attitude, intention, and 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theory and research [M]. MA: Addison-Wesley, 1975.
- [25] Sheeran P, Norman P, Orbell S. Evidence that intentions based on attitudes better predict behaviour than intentions based on subjective norms[J].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99, 29(2/3): 403-406.
- [26] Fornell C, Larcker D 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algebra and Statistics[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18(1): 39-50.
- [27] 李柏洲, 徐广玉, 苏屹. 中小企业合作创新行为形成机理研究——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解释架构[J]. 科学学研究, 2014, 32(5): 777-786, 697.
- [28] 张高亮, 张璐璐, 邱咸, 等. 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的渔民参与专业合作组织行为的产生机理[J]. 农业经济问题, 2015(8): 97-104.